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21

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

[德]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孟钟捷 译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上海三联书店



中青院 11 000674806



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

〔德〕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孟钟捷 译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德)梅尼克著;孟钟捷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9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3855-7

I. ①世… II. ①梅…②孟… III. ①德意志人—民族文化—文化史—研究 IV. ①K51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5595 号

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

著 者 /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译 者 / 孟钟捷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四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6月第2版

印 次 /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420千字

印 张 / 30.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855-7/K·189

定 价 / 54.00元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

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译 序

本书作者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是20世纪极富盛名的德国历史学家。1862年10月30日,梅尼克出生在普鲁士的萨茨威德尔(Salzwedel)。这是一个处于勃兰登堡—普鲁士心脏地区的古老小镇。其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梅尼克(Friedrich Ludwig Meinecke)是严肃认真的邮局局长,母亲索菲亚·尤丽(Sophie Julie)是每日辛勤劳作的家庭妇女。小梅尼克面对的是一个“北德的、新教的、市民的、普鲁士公务员的世界”。^①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之时,老梅尼克因故被贬职,全家迁往柏林郊区。由小镇到大城,小梅尼克的生活世界似乎依然如旧,每日听音乐、读诗歌,“如饥似渴”地阅读玛丽亚特(Frederick Marryat)和司各特(Walter Scott)的浪漫小说。^②直到晚年,梅尼克才意识到,小镇与大城之间的反差已经对其终生的发展产生了影响。^③因为在柏林,他发现了自己对于历史的偏好,历史成为“以其理想方

① Friedrich Meineck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hg. und eingeleitet von Eberhard Kessel, Stuttgart, 1969, p. 6. 本书脚注皆为中译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注明。——中译者

② Philip J. Wolfson,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7, No. 4 (1956. 10), pp. 515—516. 玛丽亚特与司各特均为英国作家。

③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p. 25.

式发现世界”的一种途径。^①

1883年,梅尼克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日耳曼学、哲学和历史。大学时代的梅尼克用功好学,多次参加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特赖奇克(Hrinrich von Treitschke)等历史学家的讲座。正是在德罗伊森的讲座中,他感到自己第一次认识到,在历史研究中,应该把个体置于思考的中心,应该从观念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思考政治行为的前因后果。^② 1886年,他在赖因霍尔德·科泽(Rheinhold Koser)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17世纪初普鲁士历史的博士论文。^③ 随后,时任普鲁士邦国秘密档案馆馆长的科泽介绍梅尼克在档案馆工作。期间,梅尼克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之友,如奥托·欣策(Otto Hintze)、奥托·克劳斯科(Otto Krauske)与马克斯·莱曼(Max Lehmann)等。在西贝尔的鼓励与指导下,梅尼克开始写作大学教授资格论文《博因传》(*Das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Hermann von Boyen*)。赫尔曼·博因(Hermann von Boyen)是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与改革时代的著名将领。在博因的“陈旧外衣”下,梅尼克发现了一种“康德思想与腓特烈大帝思想”的混合物,一种“精神习性与政治习惯的协调”。^④ 这引发了梅尼克对于19世纪德意志历史的巨大兴趣。《博因传》最终完成于1899年(第一卷出版于1896年)。1893年,在

① Philip J. Wolfson,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 p. 516.

② Johannes Gerhardt, “Betrachtungen zu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 载 www.wiwi-uni-frankfurt.de/professoren/schefold/docs/meinecke-lang.pdf, 2007年6月8日。

③ 这篇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Das Stralendorffsche Gutachten und der Jüliche Erbfolgestreit*。1609年,Jülich公爵去世,因无子嗣,他的两个外甥均有继承权。然而在帝国皇帝以及普鲁士、萨克森等邦国的干预下,信仰天主教的 Wilhelm von Pfalz-Neuburg 与信仰新教的 Johann Sigismund von Brandenburg 之间爆发了多年的继承战争。战争时断时续,直到1666年,帝国皇帝才宣布公国归勃兰登堡所有。

④ Hans Herzfeld 为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写的导言, München: Oldenbourg, 1963, XII.

主编西贝尔的推荐下,梅尼克开始担任《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编辑。1885年,西贝尔去世,梅尼克支持特赖奇克担任主编。次年,特赖奇克去世,梅尼克继任主编。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35年。

无论是孩提时代的生活经历,还是1886—1901年间的学术生涯,毋庸置疑的是,梅尼克深受普鲁士传统的影响。尽管他对普鲁士精神已心存疑虑,并力图摆脱它的控制,甚至大胆地撰文批评威廉二世的社会政策改革,然而他的生活世界、学术导师,乃至研究对象却仍以普鲁士为中心。直到1901年,这种思想“蜕皮”才有所突破。这一年,他得到了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学的教授席位。1906年,他又转聘为弗莱堡大学历史学教授。斯特拉斯堡被誉为“上莱茵河的文化之都”,弗莱堡也处于西南德意志文化圈中。这一地区深受法国文化的熏陶,又是传统的德意志地区,政治文化氛围迥异于柏林。梅尼克在这里结识了一群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如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与格奥尔格·冯·贝洛(Georg von Below)。尽管在后来的研究者看来,梅尼克与瑙曼之间的隔阂仍然很大:前者以社会为取向,后者强调的是国家、民族与共同体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核心地位;^①但也正是在瑙曼等人的影响下,梅尼克才开始思考“德意志—普鲁士”问题,并最终将这种思考融入到1908年出版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一书中。该书体现了梅尼克力图挣脱普鲁士精神影响的努力,站在德意志的角度,评述德意志统一的历史与问题。这种思考同样反映在此前1906年出版的《德意志崛起时代,1795—1815》(*Das Zeitalter der deutschen Erhebung, 1795—1815*),与此后1914年出版的《1914年德意志崛起》(*Die deutsche Erhebung von 1914*)和1918年出版的《19—20世纪的普鲁士与德意志》(*Preußen und Deutschland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①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

之中。

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梅尼克已经开始尝试运用“观念史”(Ideengeschichte, 或译“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这种对于历史方法论的偏好来源于德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大辩论。文化史学家卡尔·兰普莱西特(Karl Gottfried Lamprecht)对传统的德国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训诂式的考证史学无法阐明一般性的历史发展规律。传统的兰克学派史学家们——如赫尔曼·欧肯(Hermann Oncken)、马克斯·莱曼、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等——均以《历史杂志》为阵地，反击兰普莱西特。作为《历史杂志》主编的梅尼克虽未直接参与辩论，但无论从其学术渊源——师从德罗伊森、西贝尔、特赖奇克等普鲁士学派——来看，还是大量刊发兰克学派文章而言，梅尼克的立场是鲜明的。早在1895年为西贝尔撰写的讣告中，梅尼克便声称：“我们当中那些相信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老一代对于国家所保持的深挚感情的人们绝没有死去，而是要将他(西贝尔)的遗产满怀信心地保持下去，并且不让它僵化成为一套凝固的教条。”^①不过在兰普莱西特的冲击下，不仅是那些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们，连梅尼克也看到了传统的历史主义存在的问题。历史学家是否能运用学术方法，在政治史研究中，排除主观成分呢？兰克宣称的“如实直书”的精神是否存在实现的可能，甚或存在实践的意义呢？史学的鉴往知来的功能如何才能体现呢？人们沮丧地发现，传统的兰克式语录已无法批驳兰普莱西特。他们只能借助新康德主义学派的观点予以回击。然而殊不知，新康德主义学派对历史知识的批判甚至比文化史学派引发的危机还要严重，因为兰普莱西特并未否认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实在的过程，而新康德主义学派则宣扬不可知论。事实上，兰克学派与文化史学派之间的争论，犹如中国古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其焦点在于乾嘉式的“训诂”与宋明理学式的“微言大义”究竟孰轻孰重，这种争论并未否认研究对象的实在性，也未否认研究

①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268页。

行为的客观性。相反,新康德主义学派质疑知识构成的客观性,从而在根本上否认了19世纪以来德国史学传统的基本理论假设。^①

与其他兰克学派历史学家相比,梅尼克无疑是慎重而睿智的。他一方面坚持历史主义的传统立场,另一方面却在1908年第100期《历史杂志》的前言中,小心谨慎地接受了兰普莱西特的部分批评,认为他至少“对那些变成了单一片面的手艺人的史学家的狭隘和缺乏观念提出了警告”。历史学绝对不能放弃它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在的核心关切,不能沦为“含糊其辞的半吊子”。^②在其“观念史”的构架中,他也部分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学派的观点,加强对个体观念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梅尼克在政治立场上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如同大部分德意志学者那样,战前的梅尼克立足于保守阵营。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他把自由派与保守派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此消彼长的变化归结为客观的历史结局。在统一时代的思想家们看来,立宪制就是目标,而议会制则过犹不及。魏玛共和国成立后,梅尼克发表声明,承认自己过去是一位“君主主义者”,今后则将成为“理性的共和主义者”。^③但他对议会制造成的困境仍然抱有警惕之心。因此,在为《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第5版撰写的前言中,梅尼克坚持认为“书中最基本的思想仍将在新时代中继续保留下去”。

在这里,关于梅尼克思想演变的问题,历代研究者泾渭分明地分属两大阵营:一派倾向“连续性”,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改变梅尼克的

①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265页。另参见王晴佳:“近代德国的历史思想和实践”,载《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② 同上,第268—269页。

③ Friedrich Meinecke, “Herzensmonarchist und Vernunftrepublikler”, in: Gerhard A. Ritter & Susanner Miller (Hg.),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19: Dokumente*,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1975, p. 394.

整体思想,如梅尼克全集编订者汉斯·赫兹菲尔德(Hans Herzfeld)^①、卡尔·欣里希斯(Carl Hinrichs)^②等,美国学者帕道克(Troy R. E. Paddock)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也强调这种思想的延续性;^③另一派则强调“断裂性”,认为1918年之后,梅尼克开始反省1914年之前的历史主义,并努力与之划清界限,如瓦尔特·霍费尔(Walther Hofer)^④、路德维希·迪希沃(Ludwig Dehio)^⑤等。

事实上,即便梅尼克曾经有所反思,并试图对1914年前的观点进行修正,但是终其一生而言,梅尼克并未真正地脱离历史主义的阵营。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称之为“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至于这种转变的不成功是由于梅尼克有心无力而造成的,还是如汉斯·赫兹菲尔德所言,乃因梅尼克“有意为此付出代价”,让自身成为观念史的研究标本,则似乎是一道无解的方程。这一困境恰是作为方法论的观念史的先天缺陷。

不过对于梅尼克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世界观,或者更确切地说,它首先是一种世界观。^⑥正因如此,当1914—1918年世界大战的悲惨结局显现之时,当人们开始对德意志文化发展产生怀疑之时,当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大谈“历史主义的危机”之时,梅尼克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作为历史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挺身而出,为它辩护。历史主义的关切点在于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曾把道德排除在政治行为之外,认为政治行为具有非道德性,无须用道德准则来评价政治行为。在他看来,

① 见汉斯·赫兹菲尔德为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撰写的前言。

② 见 Carl Hinrichs 为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撰写的导言。

③ Troy R. E. Paddock, “Rethinking Friedrich Meinecke’s Historicism”, *Rethinking History*, Vol. 10, No. 1 (2006. 3), pp. 95—108.

④ Walter Hofer,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Weltanschauung. Betrachtungen zum Werk Friedrich Meineckes*, München, 1950, p. 25.

⑤ 见 Ludwig Dehio, *Friedrich Meinecke. Der Historiker in der Krise*, Berlin-Dahlem, 1953.

⑥ Johannes Gerhardt, “Betrachtungen zu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 p. 11.

国家理性(亦即“权力政治”)处于道德领域之外。然而从黑格尔以降,德国的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却希望国家也服务于更高的道德目的。兰克认为,政治权力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只有“很少几场重要的战争不能证明是真正的道德力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特赖奇克甚至把国家视作一种道德建制。这种“同一性哲学”同样反映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①一战之后,梅尼克有所动摇,在1924年发表的《在近代德国史中的国家理性》(*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deutschen Geschichte*, 英译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中,梅尼克反思了权力政治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受到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三种新力量压迫之下的国家理性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正如布莱姆斯特德(E. Bramsted)所言,这种反思如同“走三步,退两步”,犹豫不决。^②梅尼克一方面已经产生了对政治权力的悲观估价,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认为,即便作为历史个体性的国家同道德规范发生冲突,也不是因为权力与道德之间不可能形成和谐关系,而是因为国家“比几乎其他任何类型的历史个体都更加受制于自然的和生物性的必然性,以致它无法成为彻底的精神性与道德性的历史个体”^③——换言之,梅尼克仍然坚信同一性哲学的合理性,只是他现在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国家与其他历史个体之间并不完全相同。

1936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是梅尼克捍卫历史主义传统的一大力作。1920年代初,恩斯特·特勒尔奇与奥托·欣策已经讨论过“历史主义的危机”。1933年纳粹上台后,逼迫梅尼克离开《历史杂志》主编之位。这两件事从思想与现实两个角度逼迫着梅尼克尽快做出回应,以

①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280—281页。

② E. Bramsted, “Review: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0, No. 2 (1964. 4), p. 315.

③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286页。

维护德意志精神的合理性。他把18世纪晚期德意志思想生活脱离西方文化潮流的发展称颂为“人类思想中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因为这种发展打破了狭隘的自然法哲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断进步的理性伦理学,以帮助人们认识到历史演进中的个体性、多样性与变迁。因此,梅尼克开门见山地称历史主义是“在理解人类事物方面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阶段”。^①然而正如评论家不无遗憾指出的那样,梅尼克在宣扬历史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主义的原则。在《历史主义的形成》一书中所提到的各类人物,均被纳入到历史主义的标准之下予以衡量,提出个体性与多样性理论的人便契合了历史发展潮流,反之,则应被抛弃。如此一来,历史主义便成为一种普世标准,历史主义被“非历史化”了。^②事实上,这一问题早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便已存在。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华德(A. W. Ward)所言:“对于英国人而言,这种描述是不真实的,或者是学究式的”,是一种“从霍布斯到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③

也正因如此,面对纳粹政权的步步紧逼,梅尼克虽然心存厌恶,却既不逃亡,也不回避自己对扩张政策的乐观态度。在大量的信件中,梅尼克表达了自己对种种事件的“深刻情感、自豪与欢愉”。^④他与贝克将军是好友,知道后者的1944年反希特勒密谋,却未参加直接行动。^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盟军发起的“非纳粹化”与“再教育”中,德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自责浪潮。1946年秋天,哥廷根的历史学家大会主题就是“从德国历史中出来,进入欧洲历史”,从此开启批

①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287、293页。

② 同上,第290页。

③ A. W. Ward, “Review: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 No. 98 (1910. 4), p. 374.

④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295页。

⑤ 何兆武:“评梅尼克及其史学思想”,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

判德国历史“错误发展道路”的序幕。^①战时出逃的美国德裔历史学家们——如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纷纷回国举办讲座,批判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在这种环境中,已届耄耋之年的梅尼克仍然提笔,于1946年完成了《德国的浩劫》(*Die deutsche Katastrophe*)一书,既为历史主义辩护,又为德意志精神鸣屈。梅尼克认为,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出现是德意志历史发展的偶然事故,德意志精神无须为此负责。人们应该反思的是,西方文化的发展是否存在问题?^②在当时,梅尼克的观点是石破天惊的。新生代史学家——如维尔纳·康策(Werner Conze)、特奥德·希德尔(Theodor Schieder)、卡尔·迪特里希·埃尔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等——均表示无法接受。由他们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等后来形成声势浩大的“比勒菲尔德学派”,批判二战之前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直到1980年代后,德国史学界才出现了回归迹象,不少历史学家撰文,回应梅尼克的想法,如德特勒福·波伊克特(Delev J. K. Peukert)对于魏玛共和国的经典研究便以“潜伏在工业社会中的现代性危机”为关切点,力图在对魏玛共和国的研究中,“对现代性本身存在的病态与地震般的特点提出问题,也应对工业阶级社会中隐藏的毁灭性的趋势——纳粹将之显形化并导致了大众毁灭——提出问题”。^③

1948年,梅尼克被任命为柏林自由大学校长。同一年,他被美国历史学家协会授予“名誉会员”的称号。这是兰克之后,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德国历史学家。

1954年2月6日,梅尼克在柏林去世,享年93岁。

在19—20世纪的德国历史学界,很少有人像梅尼克那样,具有

① Winfried Schulz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 München, 1989, pp. 159—161.

② 此书已有中文译本,何兆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③ Detlev J. K. Peukert, *Die Weimarer Republik: 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7, p. 11.

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与令人诧异的创作力。他的一生伴随着德国近现代历史的四段重要时期：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联邦德国。其重要的四部著作恰好也同这些时期合拍：《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1908年）、《在近代德国史中的国家理性》（1924年）、《历史主义的形成》（1936年）、《德国的浩劫》（1946年）。正因如此，二战之后，人们尊称梅尼克为德国文化的“幸存象征”。^① 终其一生，梅尼克也正是为德国文化孜孜奉献了他的全部智慧和才华。^②

二

本书《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德意志文化如何形成？围绕这一问题，梅尼克从两个角度做出回答：一是作为世界民族文化个体的“德意志文化”如何从世界主义的迷梦中觉醒？二是普鲁士文化如何与德意志文化合同？这两个角度构成了本书的上下两编。

上编以“国家民族”（Staatsnation）与“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的概念界分为起点，梳理了世界主义观念与民族国家思想之间彼此交错的发展脉络。

从概念而言，文化民族“主要基于某种共同的文化经历而凝聚起来”，国家民族“首先建立在一种普遍的政治历史与法则的统一力量之上”。但是，文化民族与国家民族的实际界分却十分困难。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国家民族中也生活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民族，文化民族则有可能被视作众多国家民族的集合。前者如瑞士，后者如德意志。因此，在德意志，从18世纪末以来，一直存在着相互缠绕的两股力量，来寻求文化

① Philip J. Wolfson,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 p. 512.

② 关于梅尼克及其史学思想，中国史学界曾有少量介绍，但存在一些史实错误，或评价略显偏颇。主要成果有：袁景：“梅涅克及其历史主义精神史”，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何兆武：“评梅尼克及其史学思想”，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何兆武先生为《德国的浩劫》中译本所写译序基本以上文为底本。

民族向国家民族转变的合理方式。一股强调“民主式的个人主义”，亦即由法国启蒙运动带来的个体自由精神的普及；另一股则偏重“贵族式的个人主义”，亦即把邦国也视作个体，以松散的多国体制来保证文化的延续性。这两股潮流带来的便是世界主义观念与民族国家思想之间的张力。

随后，梅尼克分别梳理了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诺瓦利斯(Novalis, 原名 von Hardenberg)、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亚当·米勒(Adam Müller)、施泰因(Karl von Stein)、格奈泽瑙(August Neithardt Gneisenau)、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等人的思想世界。在这一连串的思想轨迹中，梅尼克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结论：德意志从文化民族向国家民族的转变，是通过逐步克服世界主义观念、树立民族思想与民族国家思想才达成的。

早期洪堡、诺瓦利斯与早期施莱格尔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观念。早期洪堡是18世纪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之子。他一方面在民族研究中强调个性，另一方面却希望借助民族研究(比较人类学)来达成他的更高理想，亦即发现人类民族。其实在洪堡心中，德意志民族正是人类民族，它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与洪堡不同，诺瓦利斯已经开始在政治的范畴中阐发思想。他的世界主义观念被梅尼克概括为“宗教—教会式普世主义”。他通过《基督教与欧洲》一文，为读者勾勒了一幅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文化之图，以期回归到“普遍的基督教联合”之中，因为“世俗权力不可能自行保持平等……只有宗教才能让欧洲重新复活，并且让各民族重新和好如初”，这样也便解决了德意志在民族国家时代的生存困境。早期施莱格尔却是在康德思想的基础之上、并超越康德而发挥世界主义理想的。他的图像是“自然法—民主式普世主义”，宣扬世界共和国。只要实现了卢梭与自然法学派意义上的民族自治与民族主权，那么这些国家都可以联合起来，成立世界共和国。

其实在诺瓦利斯与早期施莱格尔的论述中，对于民族国家个性的尊重并未缺失。然而在强大的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下，这

种对于个性的尊重被掩盖在对于普遍性的欢呼之下。这种局面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发生逆转。首当其冲的便是尚在人间的施莱格尔。施莱格尔从早期的世界主义情怀中退缩了，他开始界分民族，首先是语言，其次是宗教。最终，施莱格尔站到了诺瓦利斯曾经立足的地方，醉心于“宗教—教会式普世主义”。不过，施莱格尔的“宗教—教会式普世主义”发现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因为“通过那流传下来的等级制宪法与等级体制而建立起来的帝制，人们将同时满足民族的脱离要求与合并要求”。这样，晚期施莱格尔的世界主义观念便同启蒙运动所鼓动的世界主义观念具有了本质区别，并打上了深刻的德意志历史与文化烙印。

1804年发表《现时代的根本特征》的费希特与1807年向德意志民族发表演讲的费希特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飞跃。然而梅尼克认为，费希特的精神王国中，一直想把爱国情怀与世界主义情怀在完美塑造的人性中“最内在地联结起来”。但是，费希特最终仍然回到了世界主义的立场之上，因为费希特的国家是理性国家，他的民族也是理性民族。不过对此，梅尼克表示理解，因为“世界主义从未平淡无奇地消逝在土壤之中，年轻的民族思想不会如此轻易地、十分成功地喷薄而出”。在较长时期内，世界主义与民族特性始终彼此纠缠在一起。

与费希特相反，具有更大敏锐性、并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学者是亚当·米勒。米勒受到了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与前人费希特的影响。他在讨论治国术的著作中，开始关注“国家的自成一体的个性及其所确立的特征”，并提出国家的特有生命原则就是“民族特性”的观点。梅尼克认为，米勒是通往历史—政治性现实主义的极具重要意义的开端。不过可惜的是，米勒不久改宗天主教，步施莱格尔后尘，再次陷入到天主教普世主义思想之中。

梅尼克随后关注改革时代，讨论三位改革家：施泰因、格奈泽瑙与洪堡。梅尼克认为，三位改革家在参与规划普鲁士改革之时，除了确立民族国家观念外，仍然带着“新外表的世界主义”。施泰因希望俄国与英国势力参与德意志联邦重建；格奈泽瑙也希望借助邻国的普世性参与，来重新复活虚弱的普鲁士肌体；洪堡虽然认识到“德意志必须以自